

抗战史论集

何盛明 著



新子知

知子新

PDG

前 言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我将历年发表的有关抗战的史料和史论,再加近年撰写的,汇集成册出版。内容大致是两个部分,一是抗战时期党领导的抗日文化宣传工作,是我 80 年代党史研究的重点;二是四川人民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这是我近几年来研究和撰写史论的重点。过去一提到抗战时期的四川人,就联想到名剧“抓壮丁”中的人物,于是四川人的形象成了贪婪卑琐的王保长,参加抗战卫国的四川军人,就成了地主李老栓之子兵痞李大少。这也可见艺术形象宣传力量之大。其实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节衣缩食,努力增产,支援抗日前线。四川率先出兵抗战,前赴后继达 300 余万人,还先后征兵 300 万,在战场上伤亡、失踪者达 64 万人。无论在兵源、粮源、军需物品的供应、抢运难民和物资、抢修军用飞机场等等,都做出巨大贡献,应该如实记载下来,以传后世。切望后人不忘国耻! 不忘先烈血!

目 录

南方局领导抗战文化工作的杰出贡献	(1)
周恩来对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卓越领导	(29)
抗战时期蓬勃发展的戏剧运动	(41)
抗战时期新音乐运动的发展	(54)
抗战时期新兴木刻和漫画的抗日宣传活动	(63)
抗战时期艰苦奋进的进步出版发行事业	(73)
抗战时期的周恩来与郭沫若	(84)
老舍与全国抗敌文协	(93)
研究历史必须从事实出发——也评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	(103)
文化是反侵略锋利的武器	(111)
抗战初期中共四川党组织重建与大发展刍议	(122)
抗战时期党对四川地方实力派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130)
四川人民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	(144)

南方局领导抗战文化工作的 杰出贡献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把抗日文化工作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专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后为文化组),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文化战线的斗争,在提倡进步思想、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方局正式成立之时,正值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并制定限共、防共政策之时,面临着异常尖锐复杂的斗争。在文化上,国民党实行封建法西斯统治,采取特务手段查禁进步报刊、封闭进步文化团体、迫害进步文化人士。南方局根据这一实际情况,高举抗日民主旗帜,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传统,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工作中坚持原则立场,采取灵活方式,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尽量利用合法条件,开展多种多样的工作和斗争。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和其他报刊,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主张,进行正面斗争。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全国抗敌文协、中苏文协等合法组织,团结文化界最广大的人士,推动文艺运动深入发展,开展广泛的抗日民主活动;引导和支持学术理论界开展学术研究,用研究成果占领思想理论阵地;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批判封建法西斯反动理论和

批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支持进步出版事业的发展,通过这些工作和斗争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宣传舆论阵地、学术思想领域、进步力量始终占有优势。南方局还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对文化阵地和力量的部署,进行及时合理地调整,重庆是中心,桂林、香港曾成为重要文化据点,其他如昆明、成都、永安、曲江以至南洋等地,在不同时间、不同程度上都集中了文化界的一定力量,发挥过不同的作用。在文化队伍的建设上,南方局十分重视团结一切赞成抗日民主的文化人士,政治上引导,学术研究上鼓励,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危难时刻尽全力抢救,特别是周恩来作为党中央派驻国统区的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长期直接地领导了文化工作。周恩来以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群众中的威望和深入的工作及平易近人的作风,把文化界广大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政治环境险恶,生活条件艰苦,但广大文化工作者却能始终团结奋斗,成为一支压不垮,打不败的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民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运用党报、党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坚持抗日文化的正确方向

《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思想舆论阵地。《新华日报》1938年1月创刊于武汉,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10月武汉失守后迁重庆继续出版,由南方局领导。它广泛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政治主张,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战绩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成就,反映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呼声,支持一切进步事业和国际反法西斯斗

争。《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明确规定了办报的宗旨：“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战争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本报更将尽其所能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效力：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之共同喉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创刊后，党中央十分重视这一舆论阵地的作用，特于1938年4月2日发出《关于党报党刊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指出：“党已建立全国性的党报和杂志”，“党报正是反映党的一切政策，今后各地党部必须根据党报和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文章，当作是党的政策和方针来研究”。指示还明确规定：“《新华日报》的社论，新华、解放、群众上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的文章，必须在支部及各级委员会上，讨论和研究。”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都订一份《新华日报》，并尽一切力量来帮助和推销《新华日报》，以达到加强报纸与群众的联系。对《新华日报》的地位和作用，创刊初期董必武有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嘴巴，它向全国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作用以及爱国主义和马列主义，揭露旧社会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使国统区广大人民呼吸到新鲜空气，成为群众的精神粮食。毛泽东在评价《新华日报》时曾说过，《新华日报》是八路军、新四军以外的又一个方面军。

在《新华日报》存在的九年多时间里，大部分时间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周恩来亲自规定《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审阅重要稿件和社论；亲自动手写社论、专论、代论和新闻，他从1938年10月至1946年6月撰写发表了37篇文章。

《新华日报》根据党中央总的方针政策，在各个形势变化

的重要时刻,及时发表言论,宣传党的主张,向群众指明方向。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诱降政策,国民党汪精卫之流又公开投敌叛国,一时投降妥协危机甚为严重。针对这种情况,《新华日报》进行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宣传,同时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对友军坚持抵抗的行为,亦在舆论上大力支持。对稳定局势,安定人心,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冲破国民党当局对事变真相的封锁,《新华日报》不顾国民党方面的严密限制、监视,用巧妙办法应付了国民党新闻检查,将周恩来亲笔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页,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在《新华日报》刊登,表示悲愤和抗议,使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受到公开揭露,震动了国内外,使顽固派显得十分被动。5月,日军在中条山地区发动了一次逼降攻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丧失了五万多兵力,其后蒋介石掩饰其失败,造谣污蔑八路军坐视敌军进攻,不配合作战,《大公报》竟于5月21日发表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重复蒋介石的谰言。周恩来立即撰写了《致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先生书》,驳斥了社会上别有用心者对我抗日部队制造的谣言,说明只要和日寇打仗,我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介绍当时八路军在中条山以北,破坏日寇掌握的白晋公路等战况,证明八路军虽与国民党部队相距甚远,仍然尽量采取了策应作战的行动,使谣言自破。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势力猖獗之时,《新华日报》不断发表社论专论,对时局发展形势做出分析,指明法西斯必败,反法西斯

战争必胜的前途。同时提出了“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反对一些人依赖外援坐等胜利的思想。

1943年，当国民党企图掀起新的反共高潮时，7月7日《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党中央《七七宣言》，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对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反共分裂行动，起了舆论动员的作用。

1944年，国民党湘桂部队大败退，国民党政府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中国共产党为挽救危局，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正确主张，深得各民主党派广大进步人士的支持，以青年学生运动为代表的新的民主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新华日报》对党中央和民主党派的正确主张和群众运动，作了热情的详细的宣传报道，形成了一股争民主、反独裁的强大的舆论力量。

《新华日报》自创刊始，就十分注意加强和各界人士的联系，不断公开发起征求读者意见，开展为群众服务的活动，根据读者意见、希望和要求改进工作。报上开辟有“读者信箱”、“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经济讲座”和“自然科学”等专刊，还有“文艺之页”、“木刻之页”、“时代音乐”、“日本研究”等副刊。

1942年1-9月，《新华日报》在周恩来领导下，结合整风学习进行了报纸版面改革的工作。周恩来强调指出，党报要多方面满足读者的需要，要重视调查研究，尊重读者和作者的意见。要求采访工作要着眼群众，广辟稿源，切实反映群众的实际生活和呼声。毛泽东对民主人士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十分重视，指示《新华日报》尽量为这些人士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为此报纸开辟了“友声”专刊。《新华日报》改版

后,报纸面目一新,更加受到群众欢迎,进一步发挥了党报的宣传作用和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纽带作用。《新华日报》在舆论上积极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支持世界人民进步事业,受到国际上的重视,苏联《真理报》,英国《工人日报》都给以它很高的评价。

《群众》周刊在宣传上,除具有《新华日报》的一些主要内容外,着重宣传马列主义,经常发表论理性文章,介绍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共运的经验。对国民党顽固派不利于团结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进行揭露、批判。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攻击社会主义、宣传封建法西斯的理论,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和反击。同时,《群众》周刊还积极支持进步理论学术界的活动,给他们提供发表著作的园地,对他们的重要著作,积极进行评介。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重庆出版近八年,特别在皖南事变以后,受到国民党当局百般压制迫害:他们检扣重要文章,对重要社论文章肆意删节,封锁发行,利用邮检扣发报纸,垄断纸张,殴打报丁报童,迫害读者,指使特务暴徒捣毁营业部,等等,在这种极端艰难的情况下,报纸刊物坚持发行,成为顽固派摧不垮的战斗堡垒,赢得了广大群众和进步人士的拥护。南方局对《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工作中发生的某些失误,也及时进行认真严肃的批评和指正。1943年9月整风中,在董必武主持下,对报纸有时处理安排不当,少数同志发表观点不正确的文章进行了批评,有关同志作了自我批评。11月22日,中央宣传部致电董必武,对《新华日报》、《群众》以及《中原》杂志发表的某些文章给予批评,指示编辑部在当前形势下,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严肃的态度,继续对大资

产阶级反动派开展斗争,并要求作详细的检查和具体的改革计划。在董必武领导下,有关同志以整风精神,又进行了检查,对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26日董必武致电周恩来和中宣部,报告了有关情况和改进工作的意见。

《救亡日报》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1937年8月创刊于上海,上海沦陷后迁广州。郭沫若任社长,编辑业务实际由夏衍负责。报纸坚持团结的方针,有精辟的战局分析和实地的前线采访,经常组织刊登著名人士的稿件,很受群众欢迎。报纸扩大销售到湖南、江西、广东、四川等省,还远销到香港、南洋一带,在国内外各社会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皖南事变后被迫停刊。《华商报》于1941年4月在香港正式出版,它是皖南事变后,一大批文化人士转移香港,由南方局指示香港党组织负责筹办的,出版后受到国内外特别是华侨的欢迎,在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特别对海外广大爱国侨胞的新闻封锁上起了很大作用。

在新闻战线上,除上述报纸外,南方局所属各省区组织,在抗战开始时,就办了不少报刊,宣传抗日、宣传党的主张;形势开始逆转后,各地党组织根据南方局隐蔽精干的指示精神,有效地利用蒋介石集团与地方势力的矛盾,安排了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在地方报纸中工作,各地众多的地方小报和民办报纸,甚至国民党控制的一些报纸,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在其中工作。新闻战线对宣传抗日救亡、民主进步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各类报纸的副刊,多为进步力量所掌握,在重庆的一些进步报刊,则经常与《新华日报》联系,互相交换情况、信息和意见,舆论上共同配合,取得相当好的成效。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进步新闻界始终

团结战斗,在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开展争夺阵地的斗争中,深透到国统区各个角落,在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影响上,进步力量始终占有优势。

二、充分发挥第三厅、全国抗敌文协等合法组织的作用,广泛团结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日文化工作

中共中央南方局充分利用以郭沫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合法地位,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泛团结文化界人士一致抗日,争民主,使之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战斗堡垒。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请周恩来作副部长,还邀请郭沫若任三厅厅长。经中共代表团研究和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于2月就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开始不愿意任三厅厅长,周恩来耐心给他做了工作,指出国民党是寸权不让,要一党专政,如果我们有一个政府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可以通过它来做许多全面抗战的事情。周恩来还说:“第三厅是做宣传工作的,不要小看它的作用。老实说我倒宁肯做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因为你做三厅厅长,我才可以考虑做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这样,郭沫若才同意了上述任职。

第三厅于1938年4月1日在武汉成立,武汉失守后迁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三厅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开展了大量抗日宣传活动,特别是在武汉失守迁重庆后,在人员减少,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仍坚持开展工作,深入前线后方,宣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宣传团结进步,反对

分裂倒退。与国民党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主张完全对立。因此国民党顽固派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便对三厅活动进行限制,对各地演剧队、宣传队、战地文化服务社等进行迫害。对三厅工作人员也步步紧逼,他们三次强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均遭到反对,特别是1940年8月,蒋介石竟下手谕“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第三厅”。三厅中共党组织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亲自找当时任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提出这批人都是无党派的文化人,都在社会上很有名望,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你们搞到他们头上来了,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张治中一听感到事情严重,连忙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召见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阳翰笙,说要在政治部里面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宗旨是对文化进行研究,要三厅的人留下来继续工作。很显然,蒋介石的目的是用这个机构束缚进步文化人士的手脚,不让他们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活动。郭沫若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恩来说:“就答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大家研究之后,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即以郭沫若为首组成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工作机构。它的委员、工作人员中,包容了比第三厅更广泛的各界代表人物。如著名作家沈雁冰、舒舍予,教育家陶行知,历史学家邓初民,翦伯赞,自然科学家卢于道,文学家胡风等。在研究人员中有许多未参加过三厅的进步文化工作者,还有记者、诗人、作家、作曲家、如安娥、柳倩等著名人士,也以雇员名义参加文工会工作。

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筹备过程中。周恩来就反复地以在国民党营垒中,进行合法斗争的策略思想武装干部。他指出:国民党当局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但我们可以通过政治部所属机构的合法地位进行工作,不受他们的束缚,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去进行活动。他形象地讲,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有一个给我们的地盘站住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情吗?特别在国内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况下,他强调大家坐下来深入研究,用研究成果去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占领阵地,同时和顽固派的封建法西斯文化进行斗争,推动抗战文化事业。他鼓动大家说:“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几个问题,想写点什么书,赶快把它写出来”。他爽朗地说:“等革命胜利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呢,到那个时候,大家更忙哪,你们想研究问题、写书,时间就难找啦!”周恩来这些话使很多人心胸豁然开朗,认真埋头从事研究和著述。这一时期,文化工作委员会中许多人从哲学、历史、经济、文艺理论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文化工作委员会还跳出了只准研究的圈子,举办了各种讲座、讲演会、报告会,以学术活动方式广泛联系群众,推动民主运动。各种讲座、讲演会、报告会的主讲人均系社会名流、著名学者专家、艺术家,如张澜、沈钧儒、张友渔、王芸生、邵力子、冯玉祥等人。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讲座和文艺讲演,邓初民的《清国史》,翦伯赞的《新史学》讲座,卢于道的“人类进化问题”,冯玉祥讲三国故事,邓初民、张志让、潘念之讲国际形势,老舍讲小说,田汉讲戏剧,贺绿汀讲音乐,等等,都深受群众欢迎。当时不少国际问题的演讲,如苏德战争

前途、抗日战争前途，太平洋战争的分析，都是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有力地驳斥了妥协投降理论，影响都很深远。文化工作委员会还通过中苏文协的《中苏文化》和叶籁士等所办的世界语刊物《中国导报》，有计划地开展国际宣传。

文化工作委员会从1940年10月成立到1945年初解散的时间里，利用合法地位团结了文化界广大进步人士，为抗战、为民主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取得了丰硕的战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到了1945年2月文化工作委员会动员组织了文化界人士发表《对时局的进言》。这个进言由郭沫若、冯乃超、杜国庠、阳翰笙共同研究后，由郭沫若亲自起草，签名的有郭沫若、巴金、老舍、沈钧儒、沙千里、周谷城、茅盾、柳亚子、侯外庐、马寅初、夏衍、徐悲鸿、陶行知、阳翰笙、邓初民、翦伯赞、谢冰心、顾颉刚等300余人。进言响应中共中央关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要求国民党当局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全国一致的政府，并提出废除一切限制人民集会、集社、言论、出版、演出等自由活动之法令；取消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废除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对英、美、苏采取平等外交等六项具体意见。进言于2月22日在《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发表后，引起很大震动。因为这300多人大多是国统区知名人物，不少人在国外也有较大影响，他们一致签名，表明蒋介石极端孤立。为此蒋介石十分恼怒，派人多方追查，他们深知文工会是这次签名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立即命令解散文工会。3月31日重庆各报刊载如下消息：“郭沫

若先生领导下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已于昨(卅日)奉政治部部长命令,予以解散”。4月1日文工会举行聚餐晚会,重庆新闻界、文化界和民主党派人士、国际友人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签名纸上郭沫若亲笔写着“始于今日,终于今日,憎恨法西斯,勿忘今日”沈钧儒在会上热情赞扬了文工会的贡献,指出“文工会的被解散,只能认为是由于暂时政治上的变动,机关可以解散,但文化工作者的精神,是无论如何不能被解散的。”

三、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文艺运动在抗日民主斗争中不断发展

抗战开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文艺界是很活跃的一个方面,广大作家、文艺青年运用文艺武器,在城市、工矿、农村,以至前线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动员和教育了群众,也使文艺工作者受到实际锻炼,文艺战线出现了朝气蓬勃的现象。

武汉沦陷后,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共政策,压制进步文化活动,迫害进步文化人士,根据形势变化,南方局领导和帮助文艺界,改变工作方式,注意斗争策略,号召文化界人士到抗日根据地,到统治薄弱的乡镇山区去开展活动。1939年1月17日,重庆召开文化工作座谈会,郭沫若在会上作了《战时文艺工作》的讲演,提出“文化人到农村去,到敌人后方去”。许多文化团体和文艺工作者积极作了响应。

1941年皖南事变后,随着政治形势的更加逆转,国民党对进步文化和文化界的压制打击愈演愈烈。为了巧妙地对付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和迫害,同时又能开展活动,便采取新的方式,如借用庆祝寿辰,开纪念会等进行斗争,突出的如庆祝郭

沫若 50 寿辰和创作 25 周年,就是一次很有影响的、别开生面的群众活动。延安、桂林、昆明、成都、香港、新加坡等地都先后举行了纪念会活动,周恩来在重庆的祝寿会上讲了话。《新华日报》出了纪念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周恩来将会上讲话的内容写成代论《我要说的话》,对郭沫若的革命热情、研究精神、战斗生活作了高度评价。这次祝寿活动,既是一次重大的文化斗争,又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斗争。

在文艺活动中,南方局巧妙地运用当时的戏剧演出,作为打破政治上沉闷空气,继续推动文艺运动的一个突破口。

皖南事变后,进步戏剧活动受到压制。当时戏剧界的进步人士沈浮、应云卫等向阳翰笙提出:“我们在这里等着挨打不是办法,要干,要演戏”。阳翰笙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对此很重视,认为这个办法可以作为新的斗争的突破口,嘱阳翰笙提出一个初步计划来。之后周恩来在南方局文化组一次会议上提出:重庆这个“死城”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面对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必须想个办法予以冲破。而留在重庆文艺界的朋友也静极思动。又指出: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因此冲破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应当首先从话剧方面发起。经过郭沫若与阳翰笙研究,决定趁国民党政府解散第三厅后,解除了阳翰笙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一部分电影工作者到了香港和中央电影制片厂陷于停顿之机,联络一部分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在重庆筹组“中华剧艺社”。“中华剧艺社”由戏剧界进步人士应云卫负总责,由陈白尘、陈鲤庭、辛汉文、刘郁民、孟君谋这些知名人士,组成一个不到 30 人的精干班子。剧艺社第

一场上演了陈白尘创作的《大地回春》，打响了第一炮，接着又上演了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无情鞭挞了韦昌辉一伙搞阴谋，破坏太平天国团结，导致革命失败的罪行，引起观众很大反响。每当剧中人洪宣娇说出：“大敌当前，我们不应当自相残杀”时，观众席中立即响起暴风雨般掌声。在为郭沫若祝寿时，又演出了《棠棣之花》，剧中歌颂爱国抗敌，鞭挞卖国投降，使演出很成功。成功的演出大大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激情，在周恩来鼓动下，写出了名剧《屈原》。

在郭沫若创作《屈原》过程中，周恩来曾到郭沫若家里去，探讨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他对郭沫若说：屈原在当时受迫害，才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现在我们也受迫害，这个题材好。他对剧中高潮的《雷电颂》很欣赏，有这样一段台词“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将一切沉睡在黑暗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周恩来说，屈原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出来，这是郭沫若借着屈原之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声，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

经过各方努力，《屈原》的演出轰动了山城重庆，出现了空前的盛况。《新华日报》、《新蜀报》、《时事新报》都出了《屈原》演出特刊，大力宣传这个戏演出的成功。《屈原》的演出确如最初设想的那样在政治上、文化上突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在国统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后，1942年至1943年雾季中，“中华剧艺社”忍受着国民党顽固派的百般刁难、压迫和经济上的困难，继续演出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长夜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大戏。1942年冬从香港撤到重庆的戏剧工作者金山，司徒